

中日“友好”关系的理念、现状与未来

冯昭奎

现在，不少人讲到“中日关系”，往往有意无意地把“友好”两字省略掉了。然而，在中日双边关系的三个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中日友好关系”这个表述，特别是1978年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今年8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来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纪念活动的日本各界来宾时，再次呼吁“中日应增进互信 开创中日友好新局面”。这决非是外交辞令，而是反映了中国第4代领导人对发展中日友好的真实想法。

一、中日友好关系的理念

对中日友好的理念论述得最充分、最精辟的是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今年是他老人家诞生100周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怀念邓小平的一个帖子，有这样几句话：

“邓小平作为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深深知道历史问题的分量，但他更重视建设中日关系的未来。

“他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1978年邓小平访日正值中国共产党11届3中全会前夕，他的心中正在勾画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他在日本乘坐新干线，深深感到中国也要‘快马加鞭’地向前发展。

“访日回来不久，他促成了上海宝钢的中日合作项目，目前，一个宝钢已经赚回了7、8个宝钢。

“小平一直在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体现了他的‘求大同、存小异’的伟大思想，只要坚持这个原则，中日间就没有问题不可以解决。”

这是在互联网上出现的数以万计的怀念邓小平的帖子当中的一条。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高理论，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是指导中国处理对日关系的最高指导思想。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非常深刻而富有远见，是对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外交思想的真正继承。作为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战略家的邓小平，在他之后，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他。

邓小平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是他关于“中日友好”的论述。他在1984年3月会见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曾说：“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做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

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¹邓小平的这个精辟论述告诉我们：

第一，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

中日为什么“要永远友好下去”？我想这是中日两国面对“我们两国是永远无法搬开的近邻”的现实、承接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所做出的正确抉择。中日关系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而不是“要么爱得要死，要么恨得要死，不容许第三者插足”的婚姻关系。婚姻可能破裂，而邻国却永远无法搬开。

第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和八路军将领，邓小平对日本少数右翼否定侵略战争行为的批评最深刻最严厉，他曾指出：“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²同时告诫说，不应该助长日本少数右翼势力的气焰，如果听任他们的所作所为发展成一种倾向，一种破坏中日友好的力量，“势必要引起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反应。”³但是，他强调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因为“问题”而破坏友好“，不能因为”局部“而颠覆”大局“。邓小平的这个论点与周恩来主张的“求大同，存小异”是完全一致的。

第三，邓小平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所做出的“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

这就是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中日两国政府、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日友好这颗常青之树要靠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共同来精心培育和维护，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应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中日友好关系现状的5大特征：

第一，“政冷经热”

由于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中国方面的坚决反对，形成无法解开的“死结”，从而导致中日高层互访已中断了3年，两国政治关系越来越冷，两国相互对话越来越趋于狭窄化（过于集中在两国间的分歧而无暇深入涉及两国面临的许多地区性、全球性、合作性课题）、过分政治化（非政治问题也被政治化）的倾向。进入2004年以来，由于出现了一系列事件，包括小泉在元旦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保钓”人士登岛遭到日本警察的扣押、围绕东海油气开发的争议、中国球迷在亚洲杯足球赛对日本队的不良反应等，使本来已经很冷的中日政治关系“雪上加霜”，进一步趋向“冰冷”、倒退和甚至恶化。在这种背景下，原定的唐家璇国务委员的访日也不得不延期，中日之间不仅首脑互访中断，高层互访受影响的范围也呈扩大之势。

第二，存在3大“温度差”

中日经贸关系继续向前发展。2003年两国贸易额的增幅空前、超过1300亿

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² 引自1987年4月6日邓小平与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的谈话。

³ 引自1988年4月19日邓小平与日本首相特使伊东正义的谈话。

美元，2004 年两国贸易额可能进一步超过 1500 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势头与两国政治关系的冷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被形容为“经热政冷”。与此同时，与两国的首脑互访和高层往来中止或减少相比，两国地方政府和经济团体之间的交流继续扩大和升温，被形容为“地方热中央冷”。此外，两国文化交流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在中日韩、“10+3”、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多国或地区合作中，中日也加强了协调与合作，反映了在各国合作、地区合作之中的中日关系与中日双边关系之间也存在着“温度差”。可以看出，包括中日政治关系、两国中央政府的关系等“冷的关系”都是绕不开“靖国神社死结”的关系；而包括中日经济关系、中日地方层次的关系、中日在多边或地区事务中的关系则都是可以绕开“靖国神社死结”的关系。这个事实说明中日关系的背后存在着一股不以小泉这样的个别领导人的性格为转移的、客观的推动力量，这股力量归根到底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两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从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人们越来越感到要珍视、维护和促进中日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的扩大。

第三，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升温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如台湾问题、钓鱼岛主权及海域争端）相互“火上浇油”，导致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化倾向日益增强，甚至进而导致两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被部分民众和舆论的情绪化与“强硬论”束缚了手脚，缩小了从战略高度进行理性的政策探索和政策选择的空间。由于双方相互认为对方的民间情绪化倾向可能与政府及其政策有所联系，也导致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下降。而双方出现的种种非理性行为（比如日本右翼冲击中国驻大阪领事馆、中国某些地方的球迷针对日本足球队的不友好举动等）也有损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和地位。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政府从战略高度调整对日关系，注意加强对日政策的战略性、主动性和灵活性，已经并正在做出很大努力，而日本在“傍美至上主义”之下，在对华外交方面却少有积极的动作，其对华外交陷入战略的贫困化、姿态的强硬化、实质内容的“空洞化”、灵活性的缺欠以及对美与对华外交的极度失衡，特别是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行为本身就带有违宪的性质和非理性的情绪化色彩，对两国民众中间的情绪化反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政冷”开始影响“经热”

随着“政冷经热”局面长期化，一方面不见“经热”发挥缓解“政冷”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开始出现了“政冷”影响“经热”的迹象。

“政冷”影响“经热”的主要表现是，两国官方之间的、或有官方介入的经济合作已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日本方面，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从 2000 年度的 2144 亿日元大幅削减到 2003 年度的 967 亿日元，3 年里削减了 55% 之多。在 1999 至 2002 年度中国连续 4 年是日元贷款最大对象国，而在 2003 年度降到了第三位，位列印度和印尼之后。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但不能否认两国政治关系冷淡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中国方面，某些大型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被政治化，受到民间情绪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如前所述，近年中日双边贸易的增长十分迅速，但与中国整个对外贸易比较，

中日贸易的增长却相对缓慢，比如在 2002 和 2003 年，中国对外贸易分别增长达 21.8%和 37.1%，而对日贸易仅分别增长 16.2%和 31.1%，从而导致中日贸易在中国整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呈下降之势。2004 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增长了 35.7%，而对日出口仅增长 23.5%，增幅在中国 10 大出口对象国（或地区）中是最低的。与此同时，面对中日经贸摩擦日益增多的情况，中日迄今未能建立必要的解决争端的机制。

第五，能源问题成为重大考验

能源领域本来可能成为中日两国巨大的“合作平台”，如今却出现了经济利益与主权争端相互缠绕的复杂化趋势。能源问题反映了中日之间的确存在着很多利益交汇点和利益冲突点，从而成为对当今中日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考验：这就是两国能否充分利用既有的“利益交汇点”并发掘新的“利益交汇点”以造福于两国人民；能否避免既有的“利益交汇点”转化为“利益冲突点”；能否避免既有的“利益冲突点”引发实际的冲突；能否将“利益冲突点”转化为“利益交汇点”（例如在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开展共同开发）等等。

三、中日友好关系的未来

中日关系出现上述问题，意味着两国关系进入了复交以来未曾有过的困难时期。其原因在于：

第一，中国正在迅速发展，日本走向“普通国家”，两国面临对方国家的巨大变化都需要一个适应和理解的过程，都需要克服某些传统的、习惯的思维，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两国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轻重缓急顺序，这很可能成为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与此同时，从国际社会看，中日两国要成为真正的“负责任的大国”尚需付出巨大的努力。

第二，中日虽然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但两国都处在改革的途中，都是“改革中国家”。两国间的矛盾和难题往往与两国各自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足相联系，如何通过全面而深入的改革，使两国都能形成一种有利于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成熟的国内政治条件，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第三，世界安全问题正在发生有目共睹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即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地位日趋上升，相对于“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猖獗等）而言“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变异、环境污染等）的地位日趋上升，然而，这种安全问题的结构性变化有一个过程，人们抛弃过时的“冷战思维”、真正认识安全问题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可以预计，中日在安全领域、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课题

会日益增多，重叠利益会日益扩大，两国进行合作的空间会日益拓宽，两国在安全领域的政策取向将会从冷战结束以来的“渐行渐远”转向“渐行渐近”，但这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较长的过程。

第四，人类正处在从主要依靠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向主要依靠可再生的能源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日在谋求传统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方面可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如果两国对这种竞争关系处理不当，同时对开发和推广可再生能源及节约能源方面的必不可少的合作重视不够，也会使中日关系受到伤害。

当前，保证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供应，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于中日来说，能源问题是最需要合作的领域，也是最需要避免冲突与对抗的领域。无论是在获取油气供应来源上“狭路相逢”，还是在两国之间的广阔海域开发海底油气资源上出现竞争，还是两国从中东等地进口石油的运输线出现重合，中日两国终将认识到面对上述情况唯有开展合作别无他途，这是因为一旦出现对抗和冲突只能是“得不偿失”、“两败俱伤”。也许，能源问题有望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有望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转折点，就如同欧洲联合以“法德煤钢联营”作为出发点一样。

显然，当前造成中日关系各种困难的因素几乎都是带有“时间性”的。只要中日努力缩短两国相互适应对方变化的过程、加快各自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加快中国的“新安全观”与日本的“人类安全保障”战略的相互契合的过程、加快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与推广过程，那么，当今中日关系面临的困境和难题就有可能较快获得缓解和解决。

另一方面，在中日政治僵局尚未打破之际，两国关系迅速进入了以经济交流、地方交流与民间交流为主的阶段，而这种基层交流的日积月累，也必将为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良好发展时期奠定基础

有一句名言说：“稻穗最丰满的时候，也是它把身子弯得最低的时候”。可以预见，在不太远的将来，当中日两国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能进入高度发达的境界，两国的心态必将逐渐转向注意谦虚而不傲慢、注意稳重而不轻率、注意理智而不情绪化，从而将两国关系带入一种平和、稳定、理性的境界。显然，为了走向“中日友好关系”的未来，归根到底要靠两国扎扎实实地、坚持不懈地加强各自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真正展现出成熟的、理智的、负责任的大国的风采。

标题页

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冯昭奎

第一页

胡锦涛：

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的新型中日关系。”

第二页

当前中日关系的5个特征

- 第一，“政冷经热”
- 第二，存在5大“温度差”
- 第三，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升温
- 第四，中方对推动两国关系比日方更加主动
- 第五，能源问题成为重大考验

第三页

第一，“政冷经热”

中日对话的“狭窄化”与“过度政治化”

第四页

第二，存在5大“温度差”

- (一)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温度差
- (二) 中央关系与地方关系的温度差
- (三) 政治交流与文化交流的温度差
- (四) 政府交流与政党交流的温度差
- (五) 两国交流与多国（地区）交流的温度差

第五页

能够绕开靖国问题的各种关系比较“热”；
绕不开靖国问题的各种关系比较“冷”。

这个事实表明：

胡锦涛：妥善处理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当务之急。

- (二) 中日关系背后存在着一股不以个别领导人性格为转移的、
客观的推动力量，这股力量归根到底就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是两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
- (三) 改善中日关系要“从民间做起”，“从经济做起”，“从文化做起”。

第六頁

第三, 部分民众相互厌恶的情绪化倾向升温

(一) 胡锦涛：
問題が長引けば長引くほど被害者の感情の傷は大きくなり他の分野の交流や協力を影響を及ぼすだろう。

第七頁

(二) “政冷”开始影响“经热”

日本经济界：
「北京—上海間の高速度鉄道計画への新幹線技術の導入など大型計画をめぐり、日本企業の受注に影響が出かねない現状」と憂える。

有人说：
要是买日本的高速铁路车辆，宁可骑着毛驴上北京。
抵制日货（汽车与数码相机不同）

第八頁

(三) 中日政治关系倒退导致了两国关系的“国内政治化”

在两国国内日益形成：

“对对方国家表现强硬就在政治上有利”的气氛；
一些官员感到在政治上需要对对方国家表现强硬；
这种“政治秀”倾向对两国关系的伤害可能更甚于民间的非理性化倾向，使中日间本来可以发展的、对两国都有利的交流受到严重影响。

第九頁

(四) 导致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下降。

(五) 有损于两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和地位。

第十頁

解决的途径：

(一) 双方都不要走极端，不要激化矛盾，挑动民族仇恨。
俄罗斯南部地区发生的人质事件，以巴冲突已经告诉我们，在东北亚地区制造一个充满民族仇恨的地区对中日韩朝各国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灾难。

第十一頁

(二) 双方都需要注意不要把少数人的言行当作是代表了人民。

(三) 从民间入手，努力消除民间相互厌烦甚至有敌对的情绪，群众情绪容易受政治左右，改变“政冷”对抑止情绪化倾向会有作用。

第十二页

胡锦涛：
“坚持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

第十三页

第四, 中方对推动两国关系比日方更加主动

胡锦涛：“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
日本在“傍美至上主义”之下, 在对华外交方面却少有积极的动作, 其对外交陷入：
战略的贫困化、
姿态的强硬化、
实质内容的“空洞化”、
灵活性的缺失、
对美对华外交的极度失衡、

第十四页

中方绝非是“一厢情愿”，多么“有求于日本”，
而是：

为了顾全两国关系大局；
为了顾全亚洲地区和平发展的大局的表现；
为了亚洲的复兴；
为了共同对付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为了让亚洲成为在世界上与欧美“三足鼎立”的重要地区，
中日不要再拖后腿了。

第十五页

现在是日本该做出反应的时候了。

「日中関係は臨界点を超えつつある。
最高の外交資源を投入しないと手遅れになる」
(岡本行夫)

第十六页

第五, 能源问题成为重大考验

在能源等本来可能成为两国巨大的“合作平台”的领域,
出现了经济利益问题与主权争端问题相互缠绕的复杂化趋势。

第十七页

对于中日来说, 能源问题是最需要合作的领域,
也是最需要避免冲突与对抗的领域,
这是因为一旦出现对抗只能是“得不偿失”。

川口顺子：“不希望东海成为争端之海, 希望成中日友谊之海”。
“与其出于政治目的与中国对抗, 不如共同开发, 以谋求共同利益”
(《日本经济新闻》7月12日)

第十八页

也许, 能源问题
有望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
有望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转折点,
就如同欧洲联合以“法德煤钢联营”作为出发点一样。